

中国农民战争史

隋唐五代十国卷

李斌城主编

中国农民战争史

隋唐五代十国卷

李斌城主编

人民出版社

封面设计：尹凤阁

中国农民战争史

隋唐五代十国卷

ZHONGGUO NONGMIN ZHANZHENG SHI

SUITANG WUDAI SHIGUO JUAN

李斌城 主编

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东光印刷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10.25 印张 243,000 字

1988年8月第1版 1988年10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1—1,910

ISBN 7-01-000282-7/K·52 定价 6.00 元

编写说明

编写多卷本中国农民战争史，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一个大型集体项目，动议较早，前后参加的人数也较多，然而由于种种原因，却几起几落，迄未成书。

1982年初，重新调整了中国农民战争史编写组人员，确定全书实行分卷主编负责制。执笔者除本所同志外，还邀请了兄弟单位的一些同志。

我们准备呈献给读者的《中国农民战争史》，共分七卷，计划在近几年内陆续完成。计分：秦汉卷、魏晋南北朝卷、隋唐五代十国卷、宋辽金元卷、明代卷、清代卷、近代卷。

本卷主编李斌城。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朱丽雅同志清绘了地图。在本书编写过程中，得到了张泽咸同志的热情帮助，并利用了他编的《唐五代农民战争史料汇编》（中华书局1979年版）和《隋代农民战争史料汇编》（未刊）。朱大渭和方积六同志也提出了不少宝贵意见，特致谢意。本书还汲取了史学界有关研究成果，有的已注明，有的未能一一注明，敬请谅解。

以分卷主编负责制的组织形式，承担多卷本大型著作的编写工作，我们还缺乏经验，加上水平有限，一定还存在不少缺点或错误，热诚希望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在本书的编写过程中，曾得到人民出版社的大力支持，谨致谢忱。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中国农民战争史》编写组

目 录

编写说明

第一章 绪论	(1)
第一节 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盛衰与农民战争的大规模性和地域性	(1)
第二节 隋唐统治者重建门阀制度的意图与农民战争的战斗任务	(11)
第三节 宗教和儒学的兴盛及其对农民起义的影响	(18)
第二章 隋代各族人民起义	(33)
第一节 社会矛盾的发展和炀帝的暴政	(33)
第二节 隋末农民大起义的蓬勃发展	(43)
第三节 瓦岗、河北和江淮三大义军的斗争	(64)
一、翟让和李密领导的瓦岗军	(64)
二、窦建德和刘黑闼领导的河北义军	(80)
三、杜伏威和辅公祏领导的江淮义军	(100)
第四节 隋官起兵与隋末农民大起义的失败	(110)
第三章 唐前期农民战争	(126)
第一节 社会矛盾的日益发展	(126)
第二节 农民的反抗斗争	(129)
第四章 唐中期农民战争	(145)
第一节 社会矛盾的尖锐化	(145)
第二节 风起云涌的人民反抗斗争	(149)
一、唐中期人民反抗斗争的主要特点	(149)

二、 三大起义.....	(158)
第五章 唐后期农民战争	(170)
第一节 日益深重的社会危机.....	(170)
第二节 唐后期人民反抗斗争.....	(176)
第三节 浙东裘甫起义.....	(187)
第四节 庞勋起义.....	(195)
第五节 王仙芝起义.....	(213)
第六节 黄巢起义.....	(223)
第七节 王郢、阡能起义.....	(247)
第六章 五代十国农民战争	(253)
第一节 五代递嬗与农民反抗斗争.....	(253)
第二节 十国社会矛盾和农民反抗斗争.....	(269)
第七章 隋唐五代十国农民战争的历史作用	(281)
第一节 农民战争促进地主阶级内部的局部变化.....	(281)
第二节 奴隶制残余的显著消失与封建依附关系的 减轻.....	(288)
第三节 开创了丰富内涵的均平斗争.....	(295)
大事年表	(304)

地图目录

隋末农民大起义示意图	(63)
翟让李密领导的瓦岗军起义示意图	(71)
窦建德刘黑闼领导的河北义军起义示意图	(93)
杜伏威辅公祏领导的江淮义军起义示意图	(106)
唐前期人民反抗斗争示意图	(130)
唐中期人民反抗斗争示意图	(150)
唐后期人民反抗斗争示意图	(180)
裘甫起义示意图	(193)

庞勋起义示意图	(201)
王仙芝起义示意图	(215)
黄巢起义示意图	(227)
五代十国人民反抗斗争示意图	(280)

第一章 绪 论

隋唐五代（公元 581—960 年），是中国历史上重要时期之一。在近四个世纪里，中国社会经历了巨大变化，具有许多新的时代特点。由于长期分裂、对峙的南北重归于统一，封建社会经济和文化有新的发展、繁荣，各民族彼此联系日益密切，其社会经济也有了重大进步；中外交往频繁，奴隶制残余的显著消失，封建人身依附关系的削弱，士族地主与庶民地主的斗争，封建土地所有制的发展，统一的多民族的封建国家由空前“盛世”转为暂时衰落、分裂，使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发生的隋唐五代农民战争，既有中国古代农民战争的一般特点，又有其鲜明的时代特点和极其丰富的内容。

建国以来，隋唐五代农民战争史、特别是隋末和唐末两大农民起义的研究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绩。本书在汲取前人研究成果基础上，力图将这个历史时期的农民战争，与当时的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紧密结合起来，通过对史实的具体论述，揭示其发生的缘由、过程、失败原因和历史意义，给人们提供一部比较系统、完整的隋唐五代十国农民战争史。

第一节 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盛衰与农民战争的大规模性和地域性

公元 581 年，相国杨坚篡周，建立了隋王朝。开皇九年（公元 589 年），隋文帝出兵攻灭江南的陈王朝，南北统一，从而结束了汉

末以来长期分裂的政治局面。

为了加强封建统治，隋文帝强化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初步形成了以尚书省为首的三省六部制，分掌全国兵、刑、钱谷等事。又将地方上的州郡县三级，简化为州县二级，裁减了许多官僚机构，规定所有大小官吏原则上由中央的吏部任命，不复由地方官辟举，以加强对全国的统治。

军队是国家政权的主要部分。隋初沿袭魏周的府兵制。开皇十年（公元590年），隋文帝把军户编入民户，改由州县直接管辖，不再存在单独的军人户籍。兵士和民户同样受田，进行农业生产，只是兵士一般不向封建国家交纳租赋，而是自备军人的资粮等。各地府兵由军府统领，轮流去京师长安充当宿卫。府兵直接由朝廷指挥。除禁卫军与戍守四方的军队外，其余军旅戎器全部停罢，而由中央政府直接掌握了强大的镇压农民的专政暴力。

北周时，很注意计帐、户籍之法，使国力日趋强大。而北齐境内，却是豪富兼并，户口多有隐漏。北周灭北齐，未遑清理。隋初，“山东尚承齐俗，机巧奸伪，避役惰游者十六、七”^①。朝廷在全国采取“大索貌阅”和“输籍定样”等办法予以清理。明文规定，如果存在隐漏脱籍，户口不实，有关官吏解职，乡正、里长配流远处。允许人们互相检举揭发，让被揭发者替揭发者代输租役，清理出大批隐户。朝廷控制的户口增多，使国家征收赋役有了充实的源泉。因此，隋王朝成为甲兵强锐、财富丰盈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强盛国家。

大业十三年（公元617年）太原留守李渊父子起兵反隋，攻占长安，建立唐王朝，然后逐步镇压了农民起义军，消灭了割据势力，统一全国，唐王朝是中国历史上空前强大的国家，也是当时世界上最

^① 《隋书》卷二四《食货志》。

文明、富强的国家。

自唐开国至唐玄宗执政末年的一百四十年间，是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盛世，也可以说是隋唐政权盛世的继续和发展。唐代沿袭隋代三省六部制，但在实际工作中又逐渐有所变化。隋代三省的职能是：中书（内史）出令，门下（纳言）审议，尚书执行。而唐初产生的政事堂，乃是政治重心所在，由宰相们聚会商决军国大事。由于中书主持诏令文书的出纳，亲近皇帝，故其权位日重。唐高宗执政中期以后，政事堂遂移置于中书省。此外，皇帝还经常以参知机务、参议朝政、知政事和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等名义，使名位较低的臣僚，参预朝廷机密，削弱元老重臣的某些权力，以强化皇权。唐代的地方行政机构仍为州（郡）县二级制，地方重要政务，必须经朝廷审批才能推行，从而加强了中央对地方的控制。

唐代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加强，还表现在国内各民族的进一步融合及对边疆的开发。我国自古以来就是多民族聚居所建立的国家，因此国内各民族的动向至关重要。李渊父子自称“胡越一家”、“爱之如一”，推行一套比较开明的民族政策，在少数民族所在地区也设置州县，还有更多的羁縻州府，并让不少酋豪到朝廷为官，扩大了统治基础，壮大了力量，四周边疆地区得到不同程度的开发与巩固。

在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盛世，朝廷向全国民庶征收租庸调、地税和户税，以供国家机器使用；征派徭役、兵役，以供封建统治者驱使；征调各地的能工巧匠，到官府作坊服役。其产品基本上只供上层封建统治者使用，以满足其豪奢生活的需要，极少在社会市场上流通。全国各地的著名土特产品，也被作为土贡，定期向朝廷贡纳，以供皇帝享用。因此，在强盛的唐王朝疆域内，封建小农的自然经济始终占统治地位，而封建统治者的重农抑末政策窒息着各地商品生产的发展及其流通。

天宝十四载(公元755年)安史之乱的爆发,标志着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唐王朝由盛转衰。

出于边防战事的实际需要,从唐睿宗以来,开始在边防地区设置节度使,由将兵的都督兼领。开元年间,唐玄宗设置了八个节度使。他们逐步掌握了军、政、财权,成为“既有其土地,又有其人民,又有其甲兵,又有其财赋”^①的地方割据势力。安史叛乱爆发时,由于天下承平日久,武备废弛,经过八年,才勉强将叛乱平定,而疲备不堪的唐王朝,也无力翦除安史余孽,遂让其盘踞老巢河朔三镇。他们自署郡邑官吏,户籍不申报中央,赋税自用,虽称藩臣,实非王臣,形同国中之国。各地节度使竞相效尤。由是“方镇相望于内地,大者连州十余,小者犹兼三、四”^②。藩镇或父子兄弟相袭,或部将自代,或士卒拥立,“喜则连衡而叛上,怒则以力而相并,及其甚则起而弱王室”^③。在此后的近两个世纪里,藩镇叛服无常,专制主义中央集权日益衰落。

唐末农民大起义后,唐王朝更加衰弱了。表面的统一终为藩镇纷争的大分裂所取代。北方黄河流域走马灯式地递嬗了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和后周五家王朝。除山西的北汉小朝廷外,南方则相继兴亡了吴、吴越、南唐、闽、楚、前蜀、后蜀、荆南和南汉九姓王国,这“五代十国,皆节镇之流裔而并合者也”^④,它是唐末藩镇割据的继续和发展。

隋唐时期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盛衰,使这个时期的农民战争具有大规模性和地域性的鲜明特点。

在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隋唐时代,地主阶级对农民阶级进行残酷的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主要是通过国家机器实现的,

①② 《新唐书》卷五〇《兵志》。

③ 《新唐书》卷六四《方镇一》。

④ 《文献通考》卷二七六《封建考》。

地主阶级对农民阶级反抗斗争的镇压，也往往是由朝廷直接派兵的。因此，广大农民起来造反时，矛头自然首先指向封建国家。在王朝初期，农民起义较少，规模不大。中期，起义增多，规模扩大。及至末期，就汇聚成席卷神州大地的大规模农民战争了。兹列表如下：

在王朝末期全国性大规模农民战争爆发时，为了推翻王朝的黑暗统治，农民起义军必须采用便于在全国范围内作战的战略战术。由于隋末和唐末农民战争的背景不同，他们采用的战略战术也相异。

隋末农民战争是被隋炀帝的暴政在短期内逼出来的。起义仓促，又在本乡本土分散活动，并立即遭到官军残酷镇压。义军在血的教训中锻炼成长，战略战术也不断提高，逐渐形成以瓦岗、河北和江淮为中心的三大地域集团军，强有力地抗击了官军的围剿，义军由劣势转入了优势。这样发展下去，本可能形成统一的全国性农民起义大军，其战略战术也必然发生相应的变化。但是，由于隋官起兵，义军内部存在不少问题，这种变化便中途夭折了。

唐末农民战争是有唐一代政治、经济和社会矛盾长期发展的结果。王仙芝、黄巢领导的起义，在群众基础、思想舆论和组织工作等方面，都比隋末农民大起义有较充分的酝酿和准备。故其发难后，为实现推翻唐王朝的既定目标，采用了流动作战的战略战术。其主要特征是：不与强敌死打硬拼，不强攻设防坚固的城池；哪里敌人力量弱、何处容易得手，就以迅猛动作打到哪里，此处攻不下，遂立即转攻彼地；或忽南忽北似行云流水，或声西击东如鸟逝风飘。而官军则难以捕捉义军行踪，穷于应付，疲于奔命。如乾符三年（公元867年）七月，王仙芝在沂州（今山东临沂）不与占优势的宋威军正面硬碰，先销声匿迹，待其懈怠后，再迅速集结义军，并以凌厉攻势打其措手不及。翌年，王仙芝、黄巢合兵围攻战略要地

隋唐时期农民起义表

朝代	皇帝	在位时间	农民起义次数	时期	农民起义次数
隋	隋文帝	22	15	隋初	1
	隋炀帝	13	125	隋中期	14
唐	唐高祖	9	12	隋末	125
	唐太宗	22	8		唐前期
	唐高宗	33	14		65
	武则天	20	9		
	唐中宗	5	4		
	唐睿宗	3	3		
	唐玄宗	42	17		
	唐肃宗	5	12		
	唐代宗	17	30		
	唐德宗	25	13		67
	唐顺宗		0		
	唐宪宗	15	10		
	唐穆宗	4	2		
	唐敬宗	3	3		
	唐文宗	13	12	唐后期 (截止于 公元888 年)	108
	唐武宗	6	15		
	唐宣宗	13	15		
	唐懿宗	14	19		
	唐僖宗	14	42		

宋州(今河南商丘)，不利，旋解围遁去。乾符五年(公元879年)三月，黄巢大军进逼东都洛阳，当唐僖宗火急四处调兵遣将层层设防时，黄巢又突然麾军大举南征了。同年八月，黄巢在浙西遭到劲敌高骈拦截后，遂转入浙东，继而奇迹般地从仙霞岭林莽深处直插福建。翌年十月北伐，进军顺利，战果辉煌，而一旦荆门受挫，黄巢遂毅然改变北上襄、邓，西捣长安的作战意图，挥戈东进，迂回作战。广明元年(公元880年)五月，信州大捷后，兵逼扬州(今江苏扬州)，却不与实力尚强的守敌纠缠，而是及时强渡淮河，向中州平原马不停蹄地进击，就是一些典型的战例。

王仙芝、黄巢采用的这种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便于义军广泛发动群众，利用敌人内部矛盾，以壮大义军力量，打击官军。尤其是起义初期、义军较弱时，有利于顺利打破唐王朝的围剿，为夺取最后胜利创造条件。他们创造的这种高速度流动作战方式，对唐以后农民战争具有深远的影响。

从中国古代历史上第一次农民大起义起，直至魏晋南北朝时期，历代农民战争都基本上没有采用过这一作战方式。它之所以首先为王仙芝、黄巢所采用，绝非偶然历史现象，也不是单纯的作战方法问题。除与上述起义要推翻封建王朝密切相关外，还有以下原因：

第一，王仙芝、黄巢等义军领袖人物及其骨干是私盐贩。唐中期以后，盐的收入在唐王朝财政中占有突出地位。为保证盐的专利，唐统治者在不断提高盐价的同时，用严刑峻法禁止民间私煮私贩。不少农民被迫“淡食”。私盐贩卖的盐比官盐价廉，颇受农民欢迎。他们经常往来各地，熟悉山川地理，风土人情，与广大农民有广泛联系。为反抗官府巡院缉查而组织起来的武装，力量较弱，因此不与力量较强的缉私官军正面接触，而在其查守薄弱的间隙中四处快速流动，以求生存乃至发展。在长期周旋中，逐渐跌打

出一支比较善战的队伍，以及富有政治眼光和军事才能的领袖人物。在他们参加并领导农民大起义时，私盐贩的习气和思想意识，势必给予农民起义军以重大影响。王仙芝、黄巢不仅保留了当年流动作战的斗争方式，而且在新的条件下，大大发展了这一军事艺术。

第二，农民起义军为了更好地利用唐中央政府与地方藩镇割据势力之间的矛盾。在黄巢攻占长安建立大齐政权以前，有些藩镇听从唐中央政府征召，出兵镇压义军，有些藩镇却采取保境自固的“中立”态度，以观时变。全国各地藩镇势力也大小不一，北方黄河流域藩镇多、力量较强，江南一带藩镇少、力量较弱。王仙芝、黄巢在政治上利用唐中央政府与地方藩镇势力的矛盾的同时，在军事上，则采用高速度流动作战的斗争方式，避强击弱，尽量减少阻力，以利发展，义军在山东河南地区来去匆匆，或战或走，由北方挺进江南，重要原因之一就在于此。

但是，这种高速度流动作战，不注重歼灭官军有生力量，在起义过程中，除广州之战、潭州之战、信州之战和潼关之战等少数战役外，其他时候就很少消灭较多官军了，因此唐王朝的庞大军事机器并未遭到致命打击，可以集结重兵不断围剿义军。此外，这种高速度流动作战，不守卫攻占之地，习惯于临时打劫富豪筹集军需，不建立根据地，只满足于军事打击下地方封建政权的自然瓦解，而没有有意识地彻底摧毁它并代之以农民政权。结果，义军一走，地方封建政权接踵恢复。这样，尽管义军曾攻破许多州县，可是这些用无数鲜血换来的成果，又被自己轻易地抛弃了。所以这种高速度流动作战，表面上轰轰烈烈，犹如一股巨大的洪流，气势磅礴地滚滚流过大半个中国，虽然它无情地荡涤了李唐王朝的污泥浊水，但是洪峰一泻，沉渣依然存在。当义军进入长安，停顿下来，被迫进行防御战时，这种高速度流动作战所固有的弱点就突现

出来了。义军失去了扬长避短的条件，粮食奇缺，兵源不继，经常处在官军包围之中，无前方后方之别。黄巢没有根据这种情况及时采取新的应变措施，而是困守长安，陷于被动挨打的困境。甚至在重回长安的有利时候，也没有乘胜彻底打破官军战略包围、跳到外线作战，打开新局面，而是继续等着挨打。在不得已退出长安、生死攸关之时，黄巢又犯了军事冒险主义的严重错误，长期顿兵坚城之下，以己之短，击敌之长，丧失了迅速摆脱官军追击、向中原地区转移，重整旗鼓，闯荡新天地的难得时机，导致了起义大业急转直下的结局。黄巢这一严重错误的发端，系激愤于爱将孟楷之死，但这只是表面现象，其必然性，则是由于黄巢的流寇主义。毛泽东所说的“历史上存在过许多流寇主义的农民战争，都没有成功”^①，就是从黄巢起义和明末李自成起义等农民战争中总结出来的历史教训。

在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衰落时期，由于中央政府对地方控制力较弱，全国处于分裂状态，藩镇各据一方，强弱不一，叛服无常，加之各地政治经济发展很不平衡，因此这个时期的农民战争，具有地域性特点。

唐中期人民反抗斗争的地域性十分明显。这个时期农民起义共有 67 次。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地区。一是黄河流域，起义 7 次。二是京畿一带，起义 12 次。三是江南，起义 45 次。这三个地区的起义，占全部起义的 96%。这些起义乡土观念较重，几乎都在本地转战，不能大胆地向周围广大地区乃至全国发展。即使象西原人民连绵一个多世纪的反抗斗争，也一直基本上是在今广西僮族自治区左、右江流域进行，最盛时期只不过“控带十八州”^②。除宣、饶的方清和陈庄两支义军有点松懈联系外，其他义军之间绝少照

① 《毛泽东选集》第 2 卷第 387 页。

② 《文苑英华》卷六四八杨潭《兵部奏桂州破西原贼露布》。

应。犹如一个伸开的手掌，而不是攥紧的铁拳，因而战斗力不强，经不起严峻战斗的考验。李光弼正是利用义军上述弱点，集中优势兵力，在反动地主武装密切配合下，采取各个击破的作战方法将分散在各地的义军一一镇压下去的。

唐后期农民战争的地域性特点也十分明显。如裘甫起义时，义军只局限在浙东的象山（今浙江象山）、剡县（今浙江嵊县）、余姚（今浙江余姚）和宁海（今浙江宁海）等地小范围内活动，而没有在义军迅速壮大、广大群众造反情绪高涨的有利条件下，将起义烈火从东南一隅引向全国。刘珙是当时斗争最坚决、识见最高的将领。他提出的建议也不过是以石头城（今江苏南京）为据点，攻占浙江东、西和福建等地，实行军事割据，与李唐分庭抗礼。故王辂说，这是袭用三国时代割据江东的孙权所为也。

庞勋占领徐州（今江苏徐州）后，也与裘甫一样，没有乘大好时机将起义烈火引向全国，而是满足于抚有四州（徐、宿、濠、泗）之地，一直裹足不前，主要原因在于他深受藩镇割据思想影响，欲“遵王侍中故事”^①，割据徐州。庞勋一再上表朝廷乞求节钺、不杀所俘官员、按朝廷规定的节度使礼仪行事，都是出于这种政治需要。义军领导集团中不少人也有庞勋这样割据一方的思想。当时号称最有头脑的谋士周重提出的“赦囚徒，据扬州，北收兗、鄆，西举汴、宋，东掠青、齐，拓境大河，食敖仓，可以持久”^② 的谋略，虽比庞勋等人略胜一筹，但究其实质，仍未跳出割据称雄的窠臼。与这种地域性特点相适应，庞勋在军事上采取分戍四境的战略，这样既分散

^① 《资治通鉴》卷二五一懿宗咸通九年九月。王侍中，即原武宁军节度付使王智兴。唐穆宗长庆二年（公元822年），王智兴以节度使崔群疑忌自己为借口，乘平定王庭凑叛乱之机，驱逐崔群，占领徐州，拥兵向朝廷强邀节钺。朝廷无奈，遂以其为武宁军节度使。庞勋所说“遵王侍中故事”，就是欲循王智兴之例，割据徐州。

^② 《新唐书》卷一四八《康日知传附康承传》。